



20世纪

ZHONGGUO FANYI SIXIANGSHI

中国翻译思想史

王秉钦 著

■ 以“历史+特写”的方法，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把握中国传统与现代翻译思想发展脉络；

■ 以独到的学术眼光，浓缩古今翻译名家思想之精华，再现20世纪百年中华译学之异彩；

■ 以世界的视角与时代的高度，尊重先辈而不忘推崇新人，珍藏经典而兼顾展现当代，特辟章节介绍了近20年来国内译界的学术争鸣与论辩。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翻译思想史

王秉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 王秉钦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3
ISBN 7-310-01998-9

I. 2... II. 王... III. 翻译—思想史—中国—20世纪 IV. H0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332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 印 河北昌黎人民胶印厂印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千字

字 数 224 千字

印 数 1—3000

定 价 20.00 元

内容提要

“以史为鉴，以人为本。”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著作。

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以思想为“经”，以人物为“纬”，贯穿中国20世纪百年翻译思想史发展主线。全书分上、下篇——

上篇为“传统篇”，即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首次划分并论述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转折、发展、鼎盛四个时期，以“十大学说思想”（“文质说”，“信达雅说”，“信顺说”，“翻译创作论”，“翻译美学论”，“翻译艺术论”，“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神似说”，“化境说”，“整体（全局）论”）为中心命题，追溯其共同的历史渊源，继承、发扬、开拓传统译论思想；

下篇为“现代篇”，即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重点论述中西翻译思想“融合期”和翻译学科全面“建设期”。在论述中，更多地关注新时期的新译论、新观念、新思想和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批有学术实力和学术个性的中青年翻译家，捕捉在翻译学科建设期“传统派”与“西学派”两派论战中出现的闪光的思想。

本书以新的学术史观和研究方法，以大特写的视角，以简洁的写作方式，浓缩了数十位古今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之精华，再现了20世纪百年中华传统译学之异彩。书中有壮伟卓越的人文精神，有历久鲜活的人生（翻译）经验。诚如一句名言：“读了它，你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本书为高等学校外语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选修课教材，亦可供大专院校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的人员使用。

序

季羡林教授在《中国翻译词典》序中说：“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影响来看，中国翻译都是世界之‘最’。”这就是说，中国翻译堪称世界第一。但是什么思想使中国翻译成为“世界之最”的呢？从王秉钦教授这本翻译思想发展史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王教授这本书“以思想为经，以人物为纬”，提出了近百年来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发展主线，那就是严复的“信达雅说”，鲁迅的“信顺说”，郭沫若的“创作论”，林语堂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茅盾的“意境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翻译思想体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化。所谓信，就是必然王国；所谓雅、美、创作、艺术、神似、化境，则是自由王国。

再看一下 20 世纪西方翻译思想的发展，无论是奈达的“动态对等”或“等效翻译”，卡特福德的“功能等值”，或威尔斯的“受者等值”，强调的都是一个“等”字。因为西方译论学研究的都是西方语文之间的互译问题，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西方语文之间同多于异，有 90% 以上可以对等，所以他们提出了对等的译论。但是西方语文和中国语文之间却是异多于同，只有 40% 左右能够对等，因此，对等译论只能解决 40% 左右的中西互译问题；50% 以上的问题都要用“创作论”或“艺术论”的思想才能解决。

高健在《外国语》总第 90 期上说得好：“等值等效说比较更适合于以资料、事实为主的科技翻译，而不太适用于语言本身

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学翻译；换句话说，它更适合于整个翻译阶程中较低层次的翻译（在这类翻译中一切似乎都已有其现成的译法），而不太适合于较高层次的翻译（其中一切几乎全无定法，而必须重新创造）。”这句话一语破的，说出了中西翻译思想的差别：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翻译问题，而中国译论却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

本书以思想为纲，提出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十大学说；又以人物为纬，分析了几十个翻译家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要用一句古话来概括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我想可以用孔子说过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例如严复的“信达雅说”，信是“不逾矩”，“雅”是“从心所欲”，他翻译的《天演论》第一句就是证明。鲁迅把 suffer(受苦)译成“含辛茹苦”，多少也有一点“从心所欲”，不过程度比较轻，而“不逾矩”的程度更大。郭沫若把韦伯《夜》诗中的 fainter, dimmer, stiller(更模糊，更朦胧，更安静)译为“愈近黄昏，暗愈暗，静愈静”，“从心所欲”的程度大于鲁迅。林语堂把李清照的“寻寻觅觅”译成 so dim, so dark(如此朦胧，如此黑暗)，“从心所欲”的程度又大于郭沫若。傅雷把罗曼·罗兰的 marcher(前进)译成“顶天立地”，那几乎是无中生有了。王佐良在谈到穆旦翻译的《唐璜》时说：穆旦的“最好的创作乃是《唐璜》”，更进一步打破了翻译和创作的界限，扩大了自由王国的领域，几乎不能算是“不逾矩”了。从严复到王佐良，可以看出中国学派翻译思想的演变。“从心所欲”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不逾矩”的范围在不断缩小。而西方的翻译思想始终停留在“等”字上，只谈“不逾矩”，不谈“从心所欲”。所以西方译论无法解决中英互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问题。

至于文化问题，则更不是西方译论所能解决的。例如李白名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团圆，所以看见农历十五前后

圆圆的明月，就会使离乡背井的游子思念自己的家庭。而西方只有团聚，没有团圆的观念，见到圆月并不容易联想到团圆。因此如果只按照西方的对等论去译，就不能传情达意，不能传达原诗的文化内容。而根据中国的再创论，可以把“明月光”译成 a pool (池) of light，这就是把月光比作水了。再把“思故乡”译为 I'm drowned in homesickness(沉浸在乡愁中)，又把乡愁也比作水，这样月光和乡愁就有了联系。英文读者也更容易理解。

本书还谈到融合中西翻译思想的“多元互补论”等，那就要看新译论能否解释旧的翻译精品，产生新的翻译精品了。而本书总结了从“信达雅”到“互补论”的思想，可以说是对翻译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3年8月20日

许渊冲



作者自序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推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命运。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天翻地覆的壮丽史诗。

如同历史上一切重大变革的时代一样，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的丰功伟业，才体现着历史发展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反映着人类前进的伟大时代精神。他们中有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有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们的光辉思想，鸿才睿智，震古烁今，垂范后世，是人类永远值得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述过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梁启超、严复等就是维新时代产生的巨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就是五四时代产生的巨人，傅雷、钱钟书等就是新中国新时代产生的巨人……他们具有的“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巨人们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的创作，他们的众多的译作，他们的精辟的理论和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作为巨人的品格，巨人的融贯人类各种文化知识体系的能力及其思维方式。

他们是大海，可容纳百川，
他们是深谷，可容汇人类一切知识。



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化巨人，就在于他们具有超人的吸收、消化古今中外知识的巨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不朽的精神财富。

这些 20 世纪百年历史造就出的杰出的翻译宗师们，他们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肩负着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人类的文明，从事着艰苦卓绝的翻译大业，他们一生的杰出的翻译业绩和光辉的翻译思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近、现代到当代翻译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译史研究，以人为本”。——

翻译思想史研究的中心对象，正是作为人的译者，是这些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们。他们大多不是职业翻译家，但都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他们从事翻译活动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因此对民族思想文化的沟通起了极大的作用，在翻译史上留下了永恒的足迹。这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在这些著名的翻译家中，除了致身于翻译事业的翻译实践家和翻译理论家傅雷、朱生豪等以外，还有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严复、鲁迅，哲学家艾思奇、贺麟，文学家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文论家钱钟书，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文艺批评家成仿吾，语言学家赵元任、吕叔湘等，他们的参与，拓展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领域，加速和完善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的进程。^①

我们在考察我国两千多年光辉灿烂的翻译史的大背景下，追溯这些翻译家们的光辉的翻译生涯，挖掘其翻译思想，深究他们的杰出的历史贡献及其在翻译领域创立的理论学说及其

^① 在西方翻译史中也有同样的现象，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德里达、奎因、福柯，同时也是世界一流的哲学家，巴斯奈特、埃文·佐哈本是著名的文化学家。

社会起因，探索这些学说在我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上的演进过程，特别注意论述和总结他们的经验和对翻译的理性的闪光的思考。一言以蔽之，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把握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的时代脉络，面对新世纪，促进我国现代译学思想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研究原则，也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替他们摄特写镜头”。——

我所以选择这个研究课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了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的影响。他曾说过，我国译论界似乎“缺乏对一个重要译者的集中研究”，他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中提出要集中研究有影响的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比如，“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他译了多少书？根据什么原本译的？译文的得失；翻译主张的由来（有什么时代背景？政治因素？文化界情况？等等），是否真的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中途有无变化、修正？对翻译界的影响；与其本人创作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化中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评价。也可用同样的问题来研究任何别位作家兼翻译家。”“替他们摄特写镜头”，“要比已有的叙述做得更丰满更深刻”。于是我写了这部书，并把写作重点定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上。

关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这里“传统”不是一般的时间性概念，而是相对于“现代”的方法论概念。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深深植根于我国悠久、丰富、灿烂的文化历史，以中国古典文论和古代哲学及古典美学为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建立的中国（本土）翻译思想（它并不排除西方传统语言理论和传统译学理论的影响^①）。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经历了古代佛经翻译时期、

^① 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第一次引进英国泰特勒(Ty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的“翻译的三大原则”；30年代林语堂第一次引进意大利克罗齐(Croce)的“翻译即创作”之说。

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和现当代翻译时期。^①（“文革”十年是一条分水岭。之前，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之后，为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支谶为代表），
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
现当代的“信顺说”（鲁迅），
“翻译创作论”（郭沫若），
“翻译美学论”（林语堂），
“翻译艺术论”（朱光潜），
“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茅盾），
“神似说”（傅雷），
“化境说”（钱钟书），
“整体（全局）论”（焦菊隐）。

此十大学说思想，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构成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一条贯穿始终的长轴。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翻译思想

^①参见刘重德《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提出的：“‘中国传统译论’，从维祗难、道安、鸠摩罗什一直到当代从传统译论出发并运用新观点对之多少有所发展而且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家及其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说均应包括在内。”（《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朱志渝《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前期）》一文中指出的：“所谓‘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既包括从汉末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家和学者提出的有关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论述，还指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在理论上沿袭和发展古代、近代翻译思想的文章和专著。”（《中国翻译》2001年第2期）

^②译论中的“文质说”源于孔子的“尽善尽美”论。这是从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到韩非（“文为质饰”）等几代哲人的哲学—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译论的思想源泉。

发展史的著作。为叙述方便,本书依据中国历史的分期原则,将中国20世纪百年的翻译思想史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期(古代部分仅作为绪论,简要论述,以保持全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而在具体编写上以翻译思想自身发展规律为根据,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部分,第二部分为中国现代翻译思想部分,共七章。除绪论(第一章)外,分别论述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第二章)、转折(第三章)、发展(第四章)、鼎盛(第五章)四个时期和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一)中西翻译思想融合时期(第六章)、(二)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时期(第七章)。

每一章的结构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 (一)概论部分:概述性导读前言。简述该时期社会背景、翻译事业发展概况、主要译论译派及其相关的著名译家;
- (二)中心人物论部分:设专节分别详论每个代表人物的翻译思想,及其作为产生这些翻译思想背景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翻译生涯;
- (三)结语部分:浓缩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译论精华,贯穿中国翻译思想主线,勾勒翻译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本书不同于一般“以史料为主”的翻译史和以翻译事件、活动为主的年谱性“编年史”,也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理论研究,其主要特色是以翻译思想为“经”,以人物为“纬”,纵横交错,编织成书。具体来说:

第一,本书以翻译思想为“经”,以中国翻译思想自身发展为轴心,论述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其特性和共性,评论其科学价值、社会影响,以及对翻译实践的意义。不作纵横比较,不作中外译论系统比较,只设专节论及西方译论对中国翻译思想的影响,但仍保持中国翻译优秀传统独立发展的时间和路线。

第二，本书以人物为“纬”。思想离不开人物，举凡重要的翻译思想都是翻译家毕生翻译实践之萃，他们是中国翻译界的“东方之子”。研究、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历史地、辩证地评价、肯定他们的功绩和在翻译史上的地位，是书写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中心部分。本书正文部分专题论述了 27 位古今杰出翻译家。（叙述过程中旁论的著名翻译家逾百人。）

我国的传统历来都把“载入史册”看得非常严肃慎重。翻译思想史是一种学术史，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以学术成果作为内涵的。对其学术成果的评价也就是对学者学术生命的评价，因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总要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学术为本位，以纯学术为标准，排除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情感因素等）的干扰，做到客观、公允。在过去的翻译思想史上，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曾虚白一直是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有人把他们对翻译标准的论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些文人”掀起的“一股逆流”^①。这是不公平的。通常写历史要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时过境迁，政治因素淡化，学术思想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人们的评价自然也就公正了。本书把这些曾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载入史册”，有的还设立了专节专论。

在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我们注重选择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上都作出重要贡献的翻译家，其中把目光投向那些具有学术个性的，有助于现代翻译思想发展的“立说”，尽管也许有争议，甚至认为是“离经叛道”，但却创造了优秀的翻译作品，受到了历史的关注。一般来说，凡有价值的学术思想都是有个性的，个性的差异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是学术研究得以

^①见王澍《翻译标准观评议》（《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年，第 116 页。）



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要习惯于接纳各种不同的学术个性，融通各种个性化的学术观点，在竞争中、比较中进入求真、求实的境界，以达到繁荣学术的目的。这也是本书在为学术人物立传，“载入史册”时坚持的一条原则。^①

第三，本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原则，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相统一，并对一些优秀的重要翻译作品进行评论和实践检验，从实证角度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代表性译作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本书是目前国内论述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最新著作，它的编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它的出版，将会有助于我国新时期翻译事业的繁荣和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

笔者固陋，不敢自期对历代翻译宗匠及其翻译思想品藻论断，它只是本人在多年为研究生开设的翻译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中的一段记录。经加工补充，修订成书，作为“外语翻译理论系列教程”之一（已出版的有：《简明俄汉翻译教程》、《文化翻译学》、《语言与翻译新论》）正式出版。

李学建、郝淑霞、蒋琳洁等同志参加了部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外语教育家蔡毅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苏文学翻译家吕绍宗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梁洁筠女士、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翻译家郑海凌先生、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翻译家张咏白先生和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秉钦

2003年秋于南开大学

^①参见何九盈《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刍议》（《语言科学》2002年第1期）。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序 许渊冲	(1)
作者自序	(1)

上篇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	(3)
结 语	(18)

第二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时期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20)
第一节 概论	(20)
第二节 马建忠的翻译思想	(32)
第三节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37)
第四节 严复的翻译思想	(52)
第五节 林纾的翻译思想	(73)
结 语	(91)

第三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转折时期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93)
第一节 概论	(93)
第二节 鲁迅的翻译思想	(110)
第三节 瞿秋白的翻译思想	(128)
第四节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139)
第五节 成仿吾的翻译思想	(154)
结 语	(165)

第四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

—— 40年代: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	(166)
第一节 概论	(166)
第二节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	(171)
第三节 朱光潜的翻译思想	(180)
第四节 艾思奇、贺麟的翻译思想	(186)
第五节 朱生豪、梁宗岱的翻译思想	(194)
结语	(204)

第五章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鼎盛时期

—— 新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	(206)
第一节 概论	(206)
第二节 茅盾的翻译思想	(212)
第三节 傅雷的翻译思想	(225)
第四节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238)
第五节 焦菊隐的翻译思想	(247)
结语	(255)

下篇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

第六章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一)

—— 中西翻译思想融合时期	(259)
第一节 概论	(259)
第二节 王佐良的翻译思想	(270)
第三节 许渊冲的翻译思想	(279)
第四节 叶君健的翻译思想	(285)
结语	(292)

第七章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二)

—— 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时期	(293)
第一节 概论	(293)
第二节 “传统派”的翻译史观	(298)

第三节 “西学派”的翻译观	(302)
结语	(305)
结束语	(307)
附录:翻译名家论要	(309)
主要参考文献	(316)

